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消失的「理想住宅」方案

Disappeared "Ideal House" Project in Post War Taiwan

doi:10.6154/JBP.2012.19.003

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 (19), 2012

Journal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19), 2012

作者/Author : 劉欣蓉(Hsin-Jung Liu)

頁數/Page : 43-6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 2012/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154/JBP.2012.19.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消失的「理想住宅」方案

劉欣蓉\*

### Disappeared "Ideal House" project in Post War Taiwan

By

Hsin-Jung Liu\*\*

#### 摘要

本文試圖通過一段從未被建築史論述提及的戰後住宅治理事件，作為對於「建築現代性」歷史構成的另類觀察。1954 年在美援經費的協助下，中央政府以台北市為基地，展開一項都市住宅興建計劃，今天看來，我認為它可以被稱作是一項「理想住宅」方案。這個觀察立基於兩條線索，一是當時公共衛生論述為因應都市惡劣的環境衛生問題，嘗試為建築給排水方式、構造、開窗、廁所設備等面向，做出符合現代意涵的衛生定義，並成為當時「理想家庭」論述中關於「理想住宅」最適標準的話語框架。正是通過「衛生現代性」及「理想家庭」這兩條話語線索，這項戰後首次的住宅治理行動及其住宅圖像，得以成為戰後「建築現代性」的具體例證。

然而，這項充份承載著這個社會初嚐邁向現代生活印記的「理想住宅」方案，卻由於主流建築論述長期以西方現代主義建築為典範的論述框限，讓這段歷史完全無法出現在當前以重建「建築現代性」為核心的建築史學論述範疇內。本文對這一段住宅實踐的現代性重讀，便是要指出當前建築現代性歷史重構論述的認識侷限，進而為一條強調建築作為社會文化形式的日常空間史學方向尋找研究進路。

**關鍵字：**理想住宅、衛生現代性、現代建築、住宅類型、現代性

---

2011 年 4 月 8 日收稿；2011 年 6 月 8 日第一次修正；2011 年 6 月 21 日通過；2011 年 9 月 30 日第一次校修；  
2012 年 5 月 10 日第二次校修完稿

\*淡江大學建築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TamKang University

## ABSTRACT

Through exploring a historical event of residential governance which had never been discussed among our academic discourses on modern architecture, this paper aims at reconsidering what “modernity” means in architecture field. At the late of 1954, central government of KMT arranged a model house program to invite people be willing to build for their own. This model house program was affected by the discourse of modern hygienic on one side and of ideal home on the other. Both mingled to depict a house with well landscaping yard, appropriate scale between the site and the building, good water supply and sewage systems, economic and safe constructions, enough openings for good ventilation and natural light, and a set of modern facilities in bathroom and kitchen, etc. These all demonstrate a new value and new attitude toward a modern life were going to sprawl ever since then. And this would be viewed as the first model of “Ideal House” in Taiwan. It would be a good example to know how people were affect by these modern arrangement. Nevertheless, the western-oriented mood within modern architectural discourses let this “Ideal House” outside their vision no matter how this project showed exactly what modernity means to everyday life. Standing on the feminist point of view,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is “unseeing” would not dissolve unless modern architectural discourses come to re-evaluate the myth of western reas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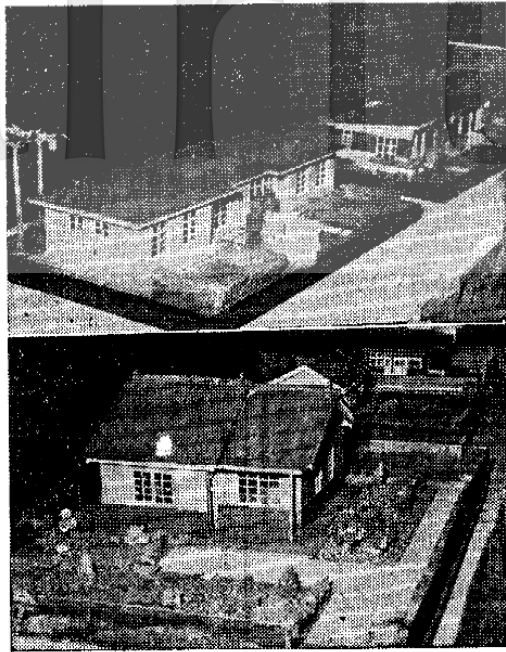
**Keywords: ideal house, hygienic modernity, modern architecture, building typology, modernity**

### 第一節 前言

1954 年 11 月中央日報非常少見地刊登了兩幅住宅模型照片，一幅是獨幢斜屋頂住宅，一幅是兩戶雙拼的平房住宅，兩類住宅模型中都有一個前院，獨棟者還有一車道銜接前院中的停車區位（中央日報，1954，11 月 11 日：第 3 版）。（圖 1）在這兩張照片旁，當日版面正大幅報導行政院「內政部都市住宅技術小組 將首先選擇台北市興建「示範住宅」，作為其未來大規模在全島展開都市住宅計劃的先導計劃。這是行政院內政部自當年 8 月宣佈要在美援經費的協助下，以新台幣三千萬元預算展開都市住宅的興建行動之後，第一波具體的住宅治理行動。實際上，行政院這一次的示範住宅治理方案規劃得相當縝密，先向社會各界宣示興建示範性住宅的決心，旋即於 1954 年底展開一項畫時代的公開邀請競圖行動，邀集建築與營造業者提供理想的住宅方案，並且在邀圖行動後，經社會賢達人士決選出房屋模型十八座，圖案五十一種，提供作為人民自力興建住宅的示範方案（中央日報，1954，11 月 4 日：第 3 版），並在台北市衡陽路國貨公司三樓軍友總社進行為期六天的展覽。繼而在 1955 年選定台北市信義

路某基地開始興建「示範住宅」一批，向社會各界人士宣示這項都市住宅治理行動，已然由國家積極展開。緊接著，內政部迅速地在短短五個月內完成二十九幢示範住宅的興建，並且隆重地舉辦了一次示範住宅揭幕儀式（中央日報，1955，10 月 16 日：第 3 版）。從現在看來，這可以堪稱戰後台灣首次由國家發動的一項「理想住宅」方案。

多麼振奮人心的國家行動，特別在那個極度蕭條而依舊動盪的年代中。然而，姑且不論這段由國家發動的住宅治理行動是否畢其功，它卻幾乎不曾出現在任何當今的住宅與建築史文獻中。這一段被擱置的事件，不曾被人們認為值得一提，以致於像是一段不曾存在的、消失的歷史。但這個幾近無言的歷史事件，真的毫無任何足以讓我們省思之處？其實不然，當我們詳加檢視後發現，這段歷史行動中的「理想住宅」方案，由於國家中介的特殊生產過程，以及當時戰後公共衛生論述關於「房屋衛生」的話語處境，讓它充份承載著這個社會初嚐邁向現代生活的具體標記。這不正是討論建築現代性落腳本土的重要場域嗎？為什麼我們竟會忽略它長達半世紀之久？



上：與處都市住宅技術小組擬覽的乙種房屋模型。

下：甲種房屋模型。

圖 1：報上刊登的二幢示範住宅模型。(資料來源：《中央日報》，1954 年 11 月 11 日，第 3 版。)

我初步的觀察是，台灣關於建築現代性的討論在長期以西方現代主義建築為典範的自我期許下，集中於關心建築的整體表現是否符合西方典範的原則，因而逐漸為自身的論述打造了一個特定的話語邊界，任何被定義於現代建築論述範疇內者，必然要能展現一種進步的、未來取向的、應用新科技的姿態，更重要的是，要能在建築表現上「像」現代／西方的建築作品。而任何無法呈現上述者，便被排除在外，不被認為能放到現代建築論述的枱面上。逐漸地，一種形式主義取向的現代建築論述成為主導。在這些嫁接西方現代主義論述的話語中，各種現實的建築實踐要不是被放到如何彰顯了現代建築精神的角度上加以評價，要不就是被視為不適切而被排除於在現代建築行列之外。在這個納入／排除的論述秩序中，存在著一種被後殖民研究者稱之為在現代化進程中時間上的「落後感」(belatedness)。(邱貴芬，2003：124) 在這種不自覺的「落後感」趨使下，現代建築論述長期如創傷回返般地緊盯著西方現代主義建築理念作為其認識論前題，傾向於將各種矛盾而複雜的社會處境中不具備現代建築運動之理性特性的建築實踐，視為不進步、非現代的保守

反動力量，難以置入現代建築論述關注的焦點範圍內。

無可否認地，如果我們比較另一支以實證知識為認識論前題的建築論述，現代建築論述的話語建構確實較能察覺建築實踐社會文化脈絡的複雜性；但這類話語在判斷實現的建築實踐（包括論及建築師的師承及其作品的表現）是否具有現代建築理性意識及血統關聯，以作為其論述核心內容的認識框架下，時常將關鍵的社會文化脈絡簡化為靜態的單向作用，以致真實社會中各種脈絡力量如何滲透、影響建築的具體實踐，乃至於具體建築實踐如何影響社會文化的意識形態及話語構成、如何形塑具有歷史特殊性的主體，便總是在其認識論框架之外被略而不提。這樣的知識話語長時期占據本土建築論述的核心，即便八〇年代末起批判政治經濟學對建築知識的介入，要求「脈絡化」(contextualize)建築實踐的認識論視野，提供了一條深化建築知識之社會學、人類學的理解取徑，也並未真正撼動現代建築論述的認識論範型。當然就更遑論人文科學領域近二十年來自女性主義與後殖民觀點的反省，關注於非西方社會的殖民現代性生成，以及現代主體之歷史、物質形塑的批判人文視角，這些都完全超出了目前現代建築論述所架構出的知識範圍之外。套句羅伯·楊(Robert Young)的話，他從傅柯(Michael Foucault)關於論述秩序的觀察裡得到體會，任何論述秩序都會試圖建構一套知識規範，而一旦這個明確的知識規範形成了，便「使人無法想像任何外在於它的事物。如果去想像任何外在於它的什麼，從定義上來說，便是無法理解的，便是瘋了。」(Robert Young, 1981：48) 上述 1955 年被我認為是「理想住宅」的住宅治理方案，表面上沒有丁點現代主義思維的影子，當然不可能被提及，除非「瘋了」。

然而，今天在人文科學領域對西方啟蒙理性性進行的反省大浪之下，建築知識範型已然面臨著躍變的臨界點，要求我們將關注的視角從現代建築的承傳、移植，轉向建築現代性構成的反省，從建築精英及精英建築的論述範疇，轉向更為普遍的現代主體的歷史、空間形塑過程的探索、轉向批判地思考建築日常實踐的具體話語與制度機制，也就是說，將建築知識從一個社會理性構成的具體實踐與否的

探求，轉向對現代理性的社會及空間構成提出批評性反省。台灣自 1980 年代末期開始，從空間文化形式的政治經濟分析視角對建築實踐進行的政治性解構已有相當知識累積，也的確達致了知識範型的斷裂與變奏。但這個以國家及統治權力的政治經濟分析為核心的批判論述，在解構建築實踐於文化形式上的國族建構與資本象徵迷思的同時，關於現代主體如何在結構性的政治經濟力量影響下透過日常空間實踐生產出微觀的權力物理學，則被暫時放到了一邊。也就是說，在這個政治經濟學式的建築知識批判中，對於「權力」的關注主要仍是集中於國家機器與統治權力透過意識形態召喚直接介入建築文化形式的表現；這樣的認識其實預設了：建築文化形式／表達國族意識形態／促成國家認同召喚，是一組直接而透明的權力論述。但我們從當代批判論述的承繼中讀到，主體的認同絕不止於國族認同，權力的身體銘刻也絕不止於文化形式所傳達的視覺層面。我們必須在這個權力的國族認同論述之外另闢分析路徑，思考建築文化形式與現代性構成如何透過日常實踐構造出具體化、肉身化的權力體制。

本文正是在這樣的企圖下，嘗試展開一次建築現代性構成的歷史探究。(註 1)一場由「衛生現代性」的建築翻譯帶來的居住及家務意義的轉變，改變了人們對一個符合現代衛生要求的住宅的認識，也改變了人們對自我的認識。本文即是在此研究基礎上，嘗試呈現戰後初期以「公共衛生」為城市治理核心向建築進行論述轉譯的過程。

給予本文理論想像啟發的是羅芙芸(Ruth Rogaski)極具開創性的研究：《衛生現代性：中國通商口岸衛生與疾病的含義》(Rogaski, 2007)。在這本以天津這個中國清末通商口岸的殖民現代性研究中，作者是通過「衛生」論述的翻譯與日常實踐展開其歷史觀察。雖然在衛生的現代性翻譯路徑上，天津有其「半殖民地」經驗的歷史特殊性，但從羅芙芸的研究，我們依然能夠得到一個方法論上的參考點，為我們的歷史觀察提供一條聚焦於現代性轉譯的後殖民視野。現代性不再只被描述成一個伴隨著殖民統治單向的由西方輸往東方的暴力過程，透過歷史研究我們看到各種外來的觀念與治理範型在翻譯、轉用過程中與既有文化之間存在著細緻的角

力與轉化。

另一方面，近年台灣學術界關於戰後公共衛生、醫療體制的形成與國家治理關聯性的歷史研究成果，(註 2)提供了我們認識戰後初期國家在城市與環境治理上展開所謂「現代性計劃」的另一個角度，讓我們從政治經濟學式的都市治理分析視野——譬如，從台灣被編入全球經濟分工的歷史過程來重寫台灣的都市計畫史(註 3)——之外，找到一個更貼近身體規訓的治理視角，重新掌握都市治理與主體的現代性改造之間存在的歷史扣聯性。也正是在這個研究取徑的啟發中，我觀察到一條從「衛生現代性」視角出發，展開「建築現代性」研究的可能路徑，特別是從衛生論述中提煉出現代主體衛生規訓的空間、物質成份，為本研究提供了理解「住宅」在建築現代性的歷史構成上必要的論述構造面向。

本文作為探究戰後住宅建築現代性構成的初步嘗試，將在第二節先簡要地整理《衛生現代性》一書中有助於我們借以觀察台灣特定歷史處境的研究視角：從現代衛生觀念自西方向中國的翻譯、輸入與衝擊到如何實踐衛生治理，乃至於租界區統治政體的衛生治理帶來都市地景的改造，具體展現清末中國城市在列強統治下，政治現實對文化觀念的影響，以及文化觀念轉而向日常生活進行物質打造的細緻過程。在這個認識啟發下，本文第三節將以戰後初期的台北為對象，探尋衛生現代性的建築轉譯。觀察的焦點放在：面對戰後初期嚴重的環境衛生與都市治理問題，公共衛生論述成為國家重要的都市治理依據，進而將此衛生關注延伸到建築衛生的管理上，為一個強調通風、採光的現代建築提出科學知識基礎。第四節則呈現另一項由社會精英發動的「理想家庭」論述，將衛生現代性轉向涵蓋居住各個層面，明確地提出了具體的「理想住宅」方案。最後小結中，我將指明，當前台灣建築現代性論述對於這段日常生活現代性打造的忽視與消音，呈現出建築論述的精英化、形式化傾向，全然背離現代建築運動大將們勇於將建築推往社會變革之路的期待。

## 第二節 衛生現代性的「跨語際」轉譯

羅芙芸在《衛生現代性》一書中採取了一個貼近身體衛生規訓的角度重寫殖民都市的現代性歷史。在本書中，羅芙芸試圖從衛生論述的翻譯與意義爭奪，以及現代西方衛生與醫學制度的移植等方向，觀察天津這個自十九世紀中期起被八個帝國勢力共同瓜分的「半殖民」城市，在西方醫學知識藉殖民勢力對該城市進行的衛生改造中，逐漸接受現代衛生新含義的歷史過程。對此「衛生」含義變化的關注，讓羅芙芸認識到天津這個城市乃至於整個中國，其實真正面臨的是，面對武裝的帝國主義到來的同時，展開了一場圍繞著「衛生」這個語詞而來的、關於如何實現現代化生活方式的爭論。為此，羅芙芸將「衛生」這個詞翻譯為「衛生現代性」，以突顯這個語詞的殖民現代性意涵。

根據羅芙芸的研究，「衛生」這個概念不論在西方或是中國，都在十九到二十世紀之間經歷了重大的變化。「衛生」曾經是中國嘗試尋找「長生之道」的自信表現，中國人透過節制飲食、應時而動、節制性欲，以設法達到養生長命之道。平行於東方，西方公元前五世紀希波克接底的《健康養生法》提倡人們調整飲食、睡眠及順應天時作習來增進生命品質；公元二世紀羅馬醫師伽林也提出要節制運動和飲食，並且將人體健康的主要外部因素歸納為：空氣、飲食、睡眠、運動與休息、分泌與排泄、靈魂的熱情等六大類，也都一樣視「衛生」為健康養生的一環。然而，十八世紀開始，西方社會在公共衛生學方面的發展大大改變了衛生的觀念，開始強調民族健康的重要性。同時，德國細菌學理論的興起，更加深了醫學專業對於人類總體生活環境的認識與控制，為一個衛生的環境提供各種殺菌、清潔的化學知識。雖然著重體液與整體醫療概念的西方傳統醫療體係面對新的醫學系統曾經在十九世紀有過抵制，但總體而言，這個轉變的過程並未遭遇太多困難。相對於西方社會，許多在十九世紀受到歐洲殖民的非歐洲社會，面對歐洲將十分不同的健康與治療方法帶入殖民地時，幾乎都經歷過一段用大衛·阿諾德《身體的殖民》(Colonizing the Body)一書所描述的身體侵犯歷程(引自 Rogaski, 2007: 8)，

包括對殖民地的人種進行各種統計、檢查與接種疫苗等等。尤其是當各種傳染病如鼠疫、霍亂、天花等疫情爆發時，西方殖民者更是「以現代的健康和衛生的口號，粗暴而強迫地對身體進行殖民」(Rogaski, 2007: 8)。

中國雖然並未經歷過歐洲帝國的殖民，但也在十九世紀中期一連串外國列強的扣關中遭逢了極大的文化衝擊。一個嶄新的衛生論述開始出現在中國各個通商口岸，教導民眾一種與傳統陰陽、氣血循環完全相異而以各種化學知識為基礎的健康之道。羅芙芸透過流傳於中國通商口岸的西方衛生學翻譯文獻，以及當時中國接觸洋務而開始習得西方科學知識的精英文人，如梁啟超、鄭觀應等人關於衛生科學的文章，記錄這個西方衛生論述的文化轉譯軌跡。以衛生學的翻譯文獻來看，羅芙芸注意到天津當時一位英國翻譯員傅雅蘭(John Fryer)，(註4)積極地與一群中國的同事們共同翻譯了不少以衛生論述為核心的西方文獻。例如在《化學衛生論》的翻譯中，傅雅蘭向中國讀者展現西方化學知識的權威，幾乎能夠解釋各種世間物質所具備的成份，以及那些成份對人體健康的影響；甚至因為西方化學科學能夠改變毒氣的組成，而被認為是人類「衛生之匙」(Rogaski, 2007: 122)。同時，傅雅蘭也將美國向兒童介紹衛生觀念的書籍翻成中文，向中國廣大讀者介紹現代衛生觀念，並且以食物的營養成份分析，向中國少年介紹英美飲食文化提供人體健康上的優秀能力。另外，傅雅蘭也曾經自1879年開始翻譯並於刊物中連載《居宅衛生論》，將衛生的焦點由營養轉向環境，由物質的化學成份及人體吸收營養的解剖，轉向「西方房屋和下水道系統的解剖」(Rogaski, 2007: 133)，強調在居住環境中建造優良的通風、乾淨的給水和順暢的污排水，來達到保衛生命的衛生目的。

中國精英文人面對嶄新的衛生話語，曾積極地試圖透過傳統的保健衛生之道來含納這個外來的概念。梁啟超在他的《讀西學書法》(1897)一書中稱贊傅雅蘭譯作展示了西方科學養生方法的同時，轉而將這種保衛生命的話語置換到國家危難處境的語境中，期待個人在衛生上的改善，能有助於國家整體國力的富強。這個從個人保健轉換到國家富強的問

題視野，讓梁啟超極力呼籲中國人應該要有更符合衛生的個人生活習慣，以便透過個人的行動來改善國力。羅芙芸從梁啟超關於民族健康話語的重構中觀察到，「衛生」即便作為一種衛生現代性為中國知識精英帶來了衝擊，但仍尚未被知識精英納入國家治理責任的一環，民族健康依舊只在人民各自應盡的責任範圍內。一直要到中日戰爭，日本展現了驚人的習自西方醫學科學而在軍事醫學上的成就，才讓中國領導精英認識到衛生現代性對於提昇國家治理能力的強大威力。

另外，一位當時英國商船公司的買辦企業家鄭觀應在其著作《中外衛生要旨》(1890)中表示，西方的知識與中國的知識兩者是相平衡的，他贊許西方衛生知識能夠分辨食物的化學組成性質，是中國衛生知識欠缺之處；但他認為即便西方科學有其優點，卻不能否認中國知識「包含了一種總體性的真理」(Rogaski, 2007: 139)，能夠涵蓋科學所無法企及的人之內在修行之道。而且，鄭觀應認為，就算西方的衛生之道有時候是有用的，但無論如何也比不上中國的科技和知識。從這兩位中國文人對當時西方衛生的回應，羅芙芸認為外國殖民主義在十九世紀晚期的中國，並沒有達到「殖民到身體」的力量。(Rogaski, 2007: 141) 然而，相對地，中國人即便在當時即可以掌握西方外科醫學的技術，但是，「西方所擁有的更高級的『衛生科學』的理念——這才是衡量個人與文化的現代性的標準——卻並沒有進入大多數中國人的思想。」(Rogaski, 2007: 143)

但在另一方面，衛生的現代概念開始進入中國的租界區，羅芙芸觀察十九世紀後半葉天津城市中由多達八個西方國家分別轄治的租界區所進行的城市衛生治理，已然開始將「衛生」的觀念轉化為具體的城市治理行動，紛紛進行租界區內的衛生環境改善及城市美化，塑造出一條與充斥著水肥惡臭氣味的中國人生活區域之間的隱形邊界。以天津的英租界而言，二十世紀初期租界內不論中國人或英國人的財富愈來愈增長，但隨著水患與污水排水問題而來的各種霍亂、痢疾和瘟疫的爆發，租界區對於周圍中國人生活慣習造成嚴重傳染原的衛生恐懼也愈發急迫。城市的治理開始依靠更多的衛生現代性技

術，包括在建築法令中對煙囪、下水道系統的管徑、以及垃圾水肥的人力系統等等進行細節性的規定，改造了原本污濁廢氣的排放，提高了環境建造的標準，也「合法」地趕走了負擔不起高額建造費用的中國貧民，為租界區打造出一個不論是中國或英國的中產階級都願意配合的衛生環境與潔淨景觀。同時，面對時而爆發的傳染病疫情，在細菌學知識的傳散下，人們皆認為水的潔治是衛生治理中最為關鍵的技術。英租界的英國工務部便在租界內沿河建起供水廠，抽取河水進行沉澱、過濾等淨水工程，為租界區內提供了潔淨的給水。就這麼，可見的潔淨城市景觀與不可見的給排水系統，將原本在外觀上並不明顯分別的租界區與非租界區之間，畫出了一條衛生現代性的邊界。正是在這個將衛生的文化翻譯放到都市治理的歷史研究中，羅芙芸讓我們像用顯微鏡一樣地看到，透過中國租界區西方各國畫界佔地的治理手段，一種屬於日常生活的文化殖民並不盡然需要透過國族意識形態的吸納與改造，而是採取了一條經由衛生而來的、在身體潔淨與健康的訴求下所帶來的物質生活的改造與收編。但不論是租界區中的衛生治理或是二十世紀初由國民黨展開新生活運動中要求的衛生禮儀，羅芙芸提醒我們，其實都並不如統治者期待地順遂，各種難以被規訓的身體慣習，文化地、階級地呈現出現代性構成中的雜音與變調。

總括而言，羅芙芸關於衛生現代性的歷史研究，在認識視野與研究方法上皆提供了值得參考之處。首先是關於從文本翻譯的閱讀中，觀察異文化觀念在翻譯詞彙上的角力與轉化。這個關於「語際書寫」的文化觀察是來自劉禾《跨語際實踐》的突破性論點(劉禾, 2008)。對於劉禾來說，提出「跨語際實踐」(Translingual Practice)這個概念，主要是因為她觀察到，「由於中國現代知識傳統創始於對西學的翻譯，採納，盜用，及其它一些涉及語言之間關係的活動，對中西交往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以翻譯活動為起點。」(劉禾, 1999: 35) 但她強調對跨語際實踐中有關現代性「翻譯」的關注，並非「技術意義上的翻譯，而是翻譯的歷史條件，以及由不同語言間最初的接觸而引發的話語實踐。」進一步地，對於從翻譯的視角觀察新思想透過新語詞闖入本土語言獲得合法性的過程中，劉禾認為重要的是要去看

到：

當概念從一種語言進入另一種語言時，意義與其說發生了“轉型”，不如說在後者的地域性環境中得到了（再）創造。在這個意義上，翻譯已不是一種中性的，遠離政治及意識形態鬥爭和利益衝突的行為。相反，它成了這類衝突的場所，在這裡被譯語言不得不與譯體語言對面遭逢，為它們之間不可簡約之差別決一雌雄，這裡有對權威的引用和對權威的挑戰，對曖昧的消解或對曖昧的創造，直到新詞或新意義在譯體語言中出現。我希望跨語言實踐的概念可以最終引生一套語匯，協助我們思考詞語、範疇和話語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的適應、翻譯、介紹，以及本土化的過程（當然這裡的“本土化”指的不是傳統化，而是現代的活生生的本土化），並協助我們解釋包含在譯體語言的權利結構之內的傳導、控制、操縱、及統馭模式（劉禾，1999：35-36）。

同時，這個對翻譯進行跨語際實踐的觀察視野，細緻地破解了典型傳統與現代論述的絕然對立。劉禾反省到，「這種方法可以使我不致陷入以往那種對抗性範式的羅網，這種預先限定了何為現代、何為傳統的舊範式在許多有關東西方關係的當代歷史寫作中依陰魂不散。」（劉禾，2008：9）羅芙芸對於衛生學翻譯文獻及中國知識精英改寫衛生學意涵的歷史研究，也的確揭示了上述取自劉禾的論點，讓我們看到一個新的概念在移入本地文化時面臨的吸納與阻卻，以致於我們無法再用以往典型的二元式話語，將「東方」與「西方」的文化邂逅以一種狹路相逢的「傳統」與「現代」之間永遠互不兩立的方式看待。這個認識既在視野上也在方法上給了開創性的指引，為本土現代建築論述中不論是「傳統」與「現代」，或是「地域性」與「全球性」的論爭找到一個出口，而且是一個帶有批判認識的出口，因為羅芙芸的研究關注於觀念論述之文化翻譯的同時，也揭顯了傳遞觀念的論述、語詞，乃至於文化形式符碼的不透明性質。正是在這裡，我們將有機會把典型環繞著建築實踐是否達致理性表現的形式論式的現代建築論述，拉回到關注於建築實踐在物質、技術面向上的翻譯、挪用過程，開啟一條非僅以現代建築「思潮」為核心的建築現代性研究路徑。

除了從認識視野與研究方法上提供的開創性之外，羅芙芸對列強在天津租界地進行都市衛生治理的觀察，更進一步將衛生現代性從論述實踐的範疇帶到具體的身體與空間規訓方案中；而且非常具顛覆性地從一個圍繞著身體污物排除的角度重新看待都市的現代性治理。這是典型政治經濟學以國家、資本為核心的分析視角難以望見的陰影面(dark side)，卻也是現代性治理最直接與身體遭逢之處。也因此，我們看到一個有可能比蘇碩斌採取傅柯式視覺敞視原型下的空間研究更緊扣到身體規訓的都市研究取徑（蘇碩斌，2002）。但也因為羅芙芸將治理凝視由都市貫穿到建築再延伸到身體，而且是各式各樣異質的、不盡然接受過一致訓練的身體，這一方面意味著都市的現代性治理也就不必然能夠像在蘇碩斌的筆下那麼精準地，在戶政、人口的空間製圖上呈現出完全理性的計算與管控，另一方面也讓我們更確定都市、建築與身體的衛生現代性建構之間被一連串不盡然一致的論述與日常實踐所貫穿，等待我們像羅芙芸一樣展開閱讀與再翻譯。

同時，羅芙芸對租界區的都市衛生治理研究觀察到，衛生、不衛生所帶來城市景觀的「高尚」、「惡劣」的區域畫分，並不真正成為外國人與中國人的空間區隔標準，反而是在有錢中國人及外國人這一邊和中國貧民的另一邊畫出一條明顯的城市界線。亦即，衛生現代性的殖民意涵透過城市地景與建築標準的訂定，緊扣住城市地租作為資本第二循環而啟動的階級文化差異，絕非簡單地從民族文化的宰制與抵抗這種刻板的二元觀點能完全解釋的了。也正是在這裡，衛生現代性的都市治理所加諸的美學意象，為城市美感的政治性分析帶入了來自殖民現代性構成的都市政治面向。

從這份關於衛生話語及城市治理的歷史探究所得到的研究啟發下，本文在關於台北都市住宅建築生產的歷史觀察中，看到了幾個過去被忽略的歷史動力，其中之一便是在不同知識學科之間進行論述轉譯的情形，特別是衛生話語對居住環境衛生的關注這個面向，從歷史文獻中我們清楚地看到關於建築的現代理解，從來都與身體的現代衛生觀念及都市現代衛生治理息息相關；另一項長期受到忽視的面向，則是以「理想家庭」型態為變遷動力的現代



性論述，也在戰後沒多久就開始浮現，並因此影響了住宅形態向著一個現代家庭模型想像的方向改變。以下便在這兩個面向上，展開對這段被消音了的「理想住宅」方案的歷史觀察與重寫。

### 第三節 衛生現代性向「理想住宅」的在地轉譯

戰後台灣的統治權由日本交回給自稱中國正統代理者的國民政府，面對的歷史情境不同於羅芙芸筆下十九世紀西方帝國壓境的中國半殖民城市處境。但不論是日人統治期間在台進行的國民化（同化與現代化）運動，或是國民政府代表的中國政權於二十世紀初為回應西方帝國強硬扣關而興起民族自覺運動，並展開現代西潮學習，都於戰後台灣繼續成為知識份子對國家治理的期待。總的來說，一股隱約的西化、現代意識並未消散，反而向各類知識話語進行擴展、轉譯。在這個歷史處境中，環繞著「衛生」而起的各種治理論述扮演了核心的角色，這當然與戰後台灣，特別是台北這個都市面臨的治理難題有關。

二十世紀上半葉，台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也曾經歷過都市與家屋的衛生改造，例如 1907 年日本總督府修正公布的《台灣家屋建築規則》便是在嚴重的鼠疫、霍亂、天花等傳染病帶來大量死亡人數的威脅下，殖民統治者試圖針對家屋建築的衛生規範提出管制措施。同時，日本統治者在都市中開始進行給排水系統的建設工作。不過，以台北市而言，都市的下水道系統僅完成了局部，而且只針對當時以日人生活為主的區域進行改造，台人生活區域並未全面興建下水道系統（范燕秋，1994）。至於家屋管制措施達到了什麼樣的衛生改善效果並無研究可茲確認，但當時由統治政權以警察系統搭配保甲制度對台人進行衛生管控，要求台人以人海戰術捕捉老鼠等舉措，確是有效抑制了鼠疫的橫行，並且大大降低了傳染病死亡人數（洪秋芬，2000）。然而，這些城市與家屋衛生改造事業對台人而言，由於是受制於殖民統治的壓力不得不遵行，並未能達到全面的衛生規訓效果。論者以為，這可以從二次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的治理前期所遭遇的「復古」心

態，以致於在衛生行政上幾乎癱瘓可以得到印證（陳君愷，1993，陳淑芬，2000）。所謂「復古」心態指的是，由於日治時期面對統治者悍然停止傳統漢醫診治而要求人民接受西方現代醫學，包括接受預防注射等等的公共衛生統治措施，台人普遍而言均敢怒不敢言，除了少數精英全力接受現代化要求之外，一般平民百姓只是表面上虛應規定；這在戰後出現明顯而嚴重的反彈，人們不再順服地接受各種現代化治理規定，特別是預防注射施打。而國民政府自接收後治理資源匱乏，人力物力及經費均嚴重不足、都市受到戰爭襲擊而多處損毀，再加上大量隨國民政府軍隊撤退來台的移民人口瞬間進駐，一時間，以台北市而言，在城市與衛生治理上幾近失控。不僅傳染病時而又起，引致人口死亡威脅；市區到處只要有空地，不論是否是計劃道路，都快速興建了一排排的簡陋木造住宅以供應急速增加的居住需求，讓原本就不完備又受到戰爭波及的給排水系統變得更加支離破碎，以致於不僅都市缺乏系統性的運作，道路交通受阻，大量的垃圾、水肥難以及時輸往市郊處理，而原本應該在家戶之內進行的各類洗菜、曬衣、刷馬桶等家務生活，在極為狹小而簡陋的居住條件下，被迫溢出到都市街道中。整個城市在當時幾乎快被垃圾淹沒，而水肥無法清疏帶來的「黃禍」也讓城市整日浸泡在薰天的臭氣中。

#### 一、衛生知識的建築轉譯

面對當時都市治理中如此嚴重的垃圾與水肥等公共衛生問題，國家由於整體建設預算的短缺，短期內難以改善基礎設施，衛生行政官員與專家學者轉而以呼籲人民主動改善「環境衛生」習慣，成為衛生治理的焦點，不論是報紙或雜誌頻頻出現各類反覆重申「環境衛生」重要性的呼籲訴求。（註 5）在一項持續多年，每年春秋兩季大掃除的環境衛生行動中，國家始終將環境衛生改善的主體放在市民身上，要求市民擁有良好的衛生習慣，才能確保總體環境衛生的品質。然而，這個環境衛生行動從來沒能夠持續超過一星期。（陳淑芬，2000）

在這種短時間內難以改變市民衛生習慣，加上嚴重缺乏基礎公共設施的嚴苛條件下，衛生知識，特別是當時的公共衛生學知識，開始嘗試將防治傳染病的知識焦點，由傳染病源的認識擴展到日常生

活環境的衛生控制上。以出版於 1953 年的《衛生學》為例，兩位時任衛生行政工作的作者（註 6）試圖將各種當時令人恐懼的流行性傳染病，連結上本島潮濕悶熱的惡劣環境，試著將「環境衛生」帶入「公共衛生」論述中，因而在既有公共衛生學以傳染病管理及流行病學、公共衛生行政及生命統計等主要知識之外，加入了原本屬於個人衛生學範疇內的環境衛生要項，包括水、空氣、採光，以及食物營養和穿著等方面的衛生知識。一方面在細菌學的論述支持下，將「水」的潔治聯繫上了身體健康的保持，並開始關心水井與廁所的挖鑿與淨化技術。另一方面，「空氣」與「日光」也被強調為身體健康的必要條件，並因此開始探究房屋在「通風」及「採光」上的作法。「居住」的衛生學，在這個階段展開了一個比殖民時期更加詳細的知識探究。（經利彬，張文彬，1972）特別的是，該書在「環境衛生篇」中加入了「房屋衛生」的討論，讓房屋衛生成為環境衛生的一環，並因此被納入以人體作為傳染病管理對象必要的「預防」知識範疇中；（註 7）這個對於環境、房屋衛生的關注，可以說是對人體作為衛生管理知識對象在空間尺度上的擴大及延伸。正是在這個公共衛生學科知識緊扣當時都市治理問題的環境衛生論述中，一個以衛生、潔淨為名的空間技術正悄悄成形。而從這個衛生知識論述的擴展中，我們看到身體的健康和疾病預防有系統地與都市的給排水系統及房屋的通風、採光等環境衛生知識連繫了起來。

## 二、細菌學與水的潔治

這個以身體作為預防感染核心所展開的現代環境衛生知識，首先是沿著現代西方關於細菌學知識的脈絡，在其知識構造中開始針對人體不可或缺的「水」展開科學的分析。在「給水」的討論中，對於不同用途的水（家庭用水、商業用水、公共用水）及不同來源的水（雨水、地面水、地下水），《衛生學》作者建議，必須透過水質分析來判斷水質好壞以及潛在的含菌數差別。水質分析又分為初步的「室外調查」，觀察水源週圍環境有否被垃圾及污水污染，再進行水的味臭、顏色、渾濁度及 pH 值的「物理檢查」，最後再以「化學檢查」判斷水質中所含氧量、氯化物、鐵、鉛，以及其硬度和細菌集落數、大腸

菌數等，嘗試藉由肉眼判讀一直到顯微鏡的層層檢查，提出判定水質優劣的知識方法。在判定了水質優劣，明瞭了水質中所含雜質及細菌成份對飲用水衛生的影響後，《衛生學》更進一步地介紹以沉澱、過濾及消毒、殺菌等方式進行「水之潔治」的水質改善方法。而這也為一個現代的給水知識引入一種帶著積極「潔治」手段的衛生「工程」概念。譬如，沉澱方式除了單純沉澱法之外，作者在化學知識的協助下，透過化學公式說明化學沉澱法為何能起沉澱作用。關於過濾的方式，作者也透過慢砂濾池的剖面圖，呈現對過濾知識的細節性認識。簡言之，一種「科學性」的分析，透過專業化學知識予以數理化的公式語彙，搭配上解剖圖示等知識形式，把看起來透明的「水」予以「可見」，以便於說明科學知識如何捕捉、消滅存在於水中的各類雜質與細菌。

這個以分析、潔治作為預防衛生的給水「衛生工程」論述，除了以「科學」敘事方式建立水的衛生知識之外，也相當務實地針對當時主要的給水型態「水井」，提出了相應於週遭環境的衛生條件。現實中，當時整個台北市的供水主要還是以收集地面水（註 8）及抽取地下水作為主要水源，甚至到了 1960 年全市給水檔案中依舊還有 24 座深水井供民眾取水。（省公共工程局，1961）（圖 2）因此，如何鑿建一座安全的水井，就變得非常重要。同時，這種對「水」所具備媒介、代換功能的現代衛生認識，讓環境衛生知識也開始關注個別家屋的引水與排水技術。水井與糞池之間的距離與污染關係再度被加以具體規範。譬如，《衛生學》作者之一的張文彬曾就水井應如何確保潔淨，在一篇問答文章中，針對水井的開口及內壁的砌築方式，以及水井與糞坑至少應距離六公尺以上方能防止污物流入水井等細節做了明確答覆。（張文彬，1953：49）面對當時仍然以水井汲水的現實，《衛生學》也特別以剖面圖呈現一個典型適當的水井構造，來說明如何保護水井不致被週圍環境污染。（圖 3）在這裡，作者再次加入一種解剖學式的剖面圖說來建立視覺說明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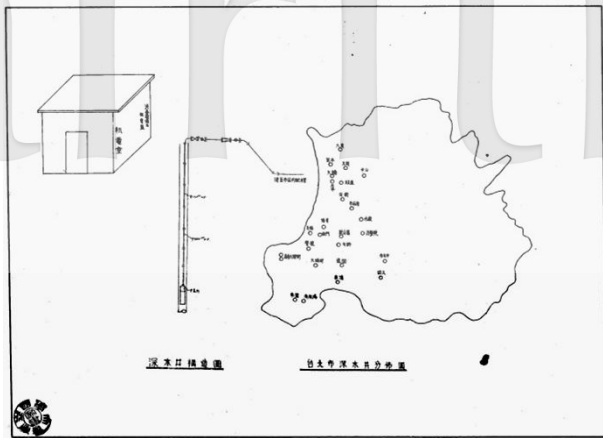


圖 2：台北市深水井分佈圖。(資料來源：台灣省公共工程局，1960，《台灣省自來水概況》，頁碼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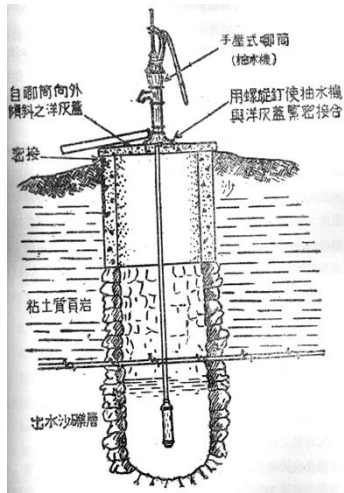


圖 3：《衛生學》中對一座「合理的井」的剖面圖示。(資料來源：經利彬、張文彬，《衛生學》，頁 125)

這類現代衛生知識建構過程中一再強調解剖學式的、顯微鏡式的觀察與敘事形式，普遍地存在於當時的社會情境中。我們看到當時重要的機關刊物《中國一周》也曾以照片強調：「在顯微鏡下，當不容那禍害自由中國的細菌存在」(註 9)(圖 4)便不難明白一種科學的視野如何藉由各類領域之間的話語交流普遍到一般人的認識上。

另外，《衛生學》也針對當時都市中最为棘手的糞便排放提出了說明。然而其為文著重點並非從系統角度關注城市如何排污及清運糞便，而是為當時的各式糞廁進行污染程度的排序。在野廁、污水坑、

乾廁、用馬桶法、掏汲廁所、改良廁所及帶水運送法等七種廁所排污方式中，作者認為由日本內務省實驗設計而於台灣加以應用的「改良式廁所」(圖 5)真正具備防止病原隨污物滲入土壤、感染地下水源的良好功能。該改良式廁所由於附帶的化糞池內砌有數個隔壁，可以使糞便順次緩慢流出，達到沉澱與過濾的效果，可以讓原本糞便中的病原菌自然死滅而讓糞便成為安全的污物。這種改良式廁所與一般人常用的掏汲式廁相比，能夠在個別家戶內就先達到除菌的功效，減低水肥在運送過程中的污染問題。



圖 4：《中國一周》封面照片，在照片底下印了一行字：「在顯微鏡下，當不容那禍害自由中國的細菌存在」。(資料來源：《中國一周》，1951.05.21 第 56 期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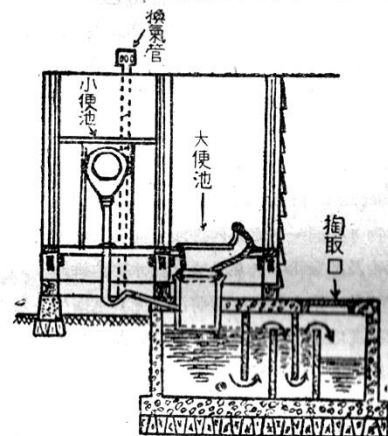


圖 5：《衛生學》一書中提及的「改良式廁所」(資料來源：經利彬、張文彬，《衛生學》，頁 148)

### 三、最符合現代衛生標準的「水洗式廁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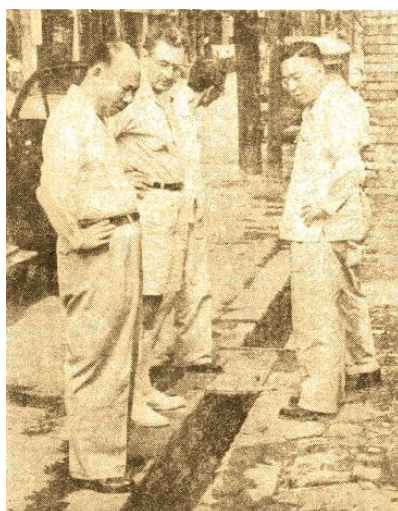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衛生學》並未受到現實條件的阻卻，更進一步地主張，最「現代化的排污法」還是「帶水運送法」，此法係將水加於糞便及其他污物中，使其在下水道中藉重力作用迅速移走，達到清糞的簡便效果。「現今於各機關、公共場所及一部份家庭中所設之水洗廁所(Water closet)，即係為帶水運送法。」(經利彬、張文彬，1972：142)而水洗廁所中，又以「放流式(Discharge system)水洗廁所：此為最近代化而最理想的方法；於歐美各國皆採用此式。此即係將糞便加水洗淨，而直送至下水道內，然後與其他污水同樣加以處理；此種廁所安全且無任何臭味。」(經利彬、張文彬，1972：142)不論此法在當時是否普及，衛生學知識透過污染程度的排序，以及水流的重力效果，為「水洗式廁所」(也就是現在通稱的「沖水馬桶」)在當代居家衛生場景中的出現，提供了必要的知識聯結，並首度透過衛生知識確認「水洗式廁所」是「最近代化而最理想的方法，於歐美各國皆採用此式。」(經利彬、張文彬，1972：142)

對照這個衛生話語，在現實的都市治理藍圖中，卻尚未開始配置任何系統性的排水設施以支持其下水、污物的流動與循環，就算這類「水洗式廁所」已零星出現在公共建築中，也只是聊備一格。更何況，當時國家因為戰爭帶來的各項損毀而準備展開修復的事務多如牛毛，但實際上又面臨政治與經濟的多重限制，以至於真實的市政治理頂多只能處理一些零碎的事務，幾乎難以展開什麼具規模的基礎建設，更遑論開始任何都市給排水系統的建設。(曾旭正，1994：29)(圖6)

而現實生活中，也絕少有人使用這種現代化的「水洗式廁所」，因為它非常昂貴，我們從時任台北市長黃朝琴談及他興建自宅別墅時特別花了百萬元添購這種現代化浴廁設備的文字中可以想見(黃朝琴，198：279)，此類「水洗式廁所」絕非一般人所能負擔。實際上，當時甚至連稍具規模的都市店屋中都不盡然有自來水，許多家戶是在長條店屋的天井處自行設置抽水幫浦，其它則是各自到公井挑水回家儲放。大部份店屋中的廁所是掏汲式，也就是在廁所位置下方挖出糞坑，待一段時日便需要找挑

糞夫加以清除。除此之外，大量大陸政治移民來台居住的簡易木造住宅則多是一或二個大統間，必須依靠公廁及夜晚的尿桶解決排洩問題，幾乎不可能有餘地設置所謂帶水運送式「水洗廁所」。

但不知是否正由於這種稀有性與昂貴性帶來的視覺奇觀效果，讓現代衛生知識的建構，得以挾帶出一種人們未曾體驗過的新衛生活型態，並且成為進步世界「新穎」現代科技生活的知識中介者。也更由於這個冷酷現實的對照，更突顯出這類衛生話語在當時帶有的「文明」意涵。



共同安全總署中國分署署長施幹克(左起第二人)視察台北溝渠。該署與農復會，兒童救濟基金會，世界衛生組織等機構，積極協助台省推進衛生工作。

圖6：這是一張當時政府官員陪同美國顧問視察都市衛生環境的照片，從圖說文字可以看出當時建設工作的困難。「公共安全總署中國分署署長施幹克(左起第二人)視察台北溝渠。該署與農復會，兒童救濟基金會，世界衛生組織等機構，積極協助台省推動衛生工作。」(資料來源：《今日世界》，1953，30期，封面裡)

### 四、房屋衛生中的通風與採光

除了「水的潔治」與「污水」排放的知識論述，「空氣」與「光線」也被納入衛生控制要項中。以總體人口健康為基礎的公共衛生論述，開始將衛生管理的觸角延伸到建築中，強調房屋在構造、通風、採光上的重要性。在《衛生學》這本試圖建構一個合於當時公共衛生治理的書中，便清楚地呈現出這個向建築技術展開的衛生知識圖像。觀察其問題預

設，似仍將台灣視為瘴癘之地，認為台灣典型潮濕氣候容易引致疾病。因而，在對房屋的建築構造建議中，不論是地基、建築座向、牆壁、地下室、室內高度、地板與窗，都以如何減低建築的潮濕，並且盡可能保持乾燥為考量。在通風與採光的討論中也存在同樣的知識／技術目標。亦即試圖探尋如何透過通風與採光的控制，改善台灣一般家屋室內環境的昏暗濕熱問題。在此知識目標下，一條延續著上述解剖學與顯微鏡下的科學知識，透過論述及視覺化圖示，強調出原本不可見的「風」與「光」對建築室內及人體健康的影響。譬如，在關於「自然通風」究竟如何因為房間牆面開口位置的差別而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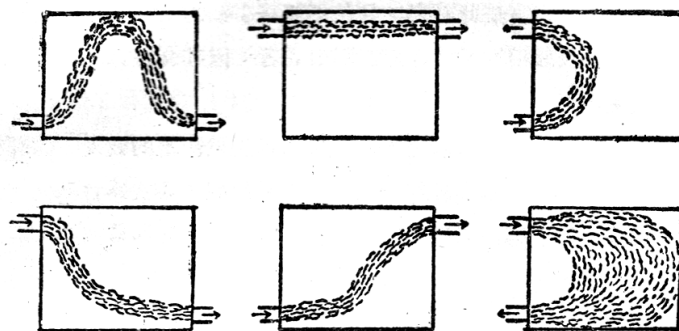


圖 7：《衛生學》一書中關於「通氣口及入氣口位置與室內氣流之關係」平面圖示（資料來源：《衛生學》，1953，頁 154）

此外，《衛生學》也展開關於建築室內光線的討論。（圖 8）室內光線能否照射充足，必須考慮的要項不止與建築本身室內高度及開窗大小有關，還與建築面前道路寬度以及道路對面的建築高度有關。這樣的討論明顯地是將「採光」放到都市脈絡中加以考慮。台灣傳統店屋建築在構造條件的考量下，大多為二層樓高，其室內光線的考量通常是通過建築平面深度與天井、中庭的尺度控制來進行，普遍而言仍然較為陰暗。日治時期的殖民統治者為強化家屋通風、採光等衛生條件的改善，曾於 1900 年訂定《台灣家屋建築規則》中規定家屋居室開窗面積，不得小於室內面積 1/10 的最低要求，是國家重視居住環境光線品質的首度規範性要求。（謝文豐，2005：33）相較之下，《衛生學》翻譯下的採光模型，已經開始在都市尺度的考量下思考建築「採光」知識，對於當時的都市現實而言，提早地給了「採光」一

響空氣在房屋室內流動的說明中，作者以六個代表房屋邊界的方形簡圖，疊加上代表風行方向的箭頭，呈現出原本難以描述的室內「通風」情形。（經利彬，張文彬，1972：152-153）（圖 7）並因此藉由對風的可見化呈現，來表達其改善室內空氣的衛生效果。在這個房屋居室的通風話語中，存在著對「新鮮空氣」之於人體健康的效用考量。新鮮空氣被認為能為人體呼吸提供必要的氧氣以供身體維持運作並協助調節體溫。若一居室通風量充足，就可以透過引入外界的新鮮空氣，稀釋並排除各種不良空氣、悶熱、塵埃、熱氣，保持室內室溫及濕度，為人體帶來舒適與健康。

個預示的都市脈絡，也更加強了「光線」之於居住的重要與不可多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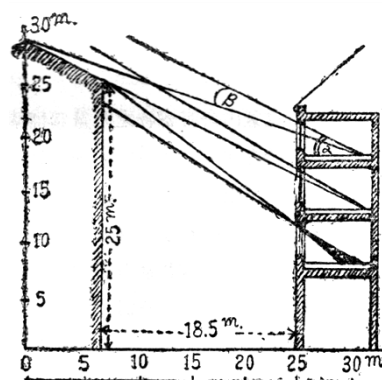


圖 8：《衛生學》一書中關於「室內自然採光條件」剖面圖示（資料來源：《衛生學》，1953，頁 158）

這個關於採光與通風的討論並非首見。戰後由正中書局再版陳果夫所著的《衛生之道》(陳果夫, 1947), 將「浴日光」及「暢空氣」放在衛生十大原則的第一、二項。(註 10) 這個衛生十大原則正是作者陳果夫自民國五年組織〈中國衛生教育社〉時所提倡的衛生教育綱領。在陳果夫的談論中, 日光與空氣都是生命的基本要素, 日光由於包含有紫外線, 能促進身體活動力, 強化身體抵抗力, 甚且具有醫治神經炎、貧血、肺病等病症。因此建議人們應該適度地在日光下曝曬以強健體魄。同時, 空氣更是人體存續的重要元素, 每人每天平均要呼吸二萬餘次, 沒有了空氣人就會窒息而死。相應地, 居室開窗也格外重要。他舉例中國舊式房屋多半只有一面開窗, 不利居室內的通風, 且若遇室內開窗方位不對, 甚至會違害生命。因此呼籲人們要注意房屋的開窗與朝向。

很明顯地, 《衛生之道》關於採光、通風等衛生話語, 都是圍繞著各別個人如何強健身體而展開的, 但戰後《衛生學》對採光與通風的討論, 卻將衛生關注的視角從身體保健移向建築的技術考量。我們暫時不去論究這個關注視角究竟是循著什麼樣的論述途徑轉變, 在這裡比較關鍵的問題是, 這個關注視角的轉變究竟達到什麼樣的知識權力效果? 就其最直接的意涵而言, 身體的衛生邊界被拉到一個更大的建築居室尺度上加以考慮, 也就是說, 沒有這個建築尺度的衛生考慮就不可能有衛生的身體。與此同時, 也就意味著將身體衛生的自我關注轉向了衛生的治理關注, 因而明顯地呈現出以國家治理角度出發, 進行一系列從身體的疾病防治到環境與建築衛生規範、控制的話語視角。然而, 有關於建築衛生的規範早在日治時期就已被寫入《台灣家屋建築規則》中, 亦即由國家治理角度出發對家屋衛生包括通風、採光、排水等規範要求早已存在, 而中國自 1945 年公佈並於台灣頒行同時適用的《建築技術規則》也有針對通風、採光等建築衛生予以明訂。《衛生學》在這裡關於建築衛生知識的治理轉向, 無疑地並非創舉, 我們從它採取的敘事方式, 可以初步研判, 它為原本簡化的建築規範提出了進一步深化的科學知識依據, 它將存在於建築法令規範中僅限於各別建築開口面積比例的認識, 加入了開窗方式的科學分析(譬如, 每一居室至少要有兩向對

外開窗, 並且儘可能對開以達氣流的對流效果, 以及為都市建築受週邊建築高度影響而計算開窗高度以達適當採光效果的考慮)。只不過這個房屋衛生的科學觀點, 卻一直要到 1974 年國家重新修訂《建築技術規則》時才被納入相關管制規定中。

但在這段自 1950 年代初期到 1974 年由國家提出更細緻的建築管制規訂的二十年間, 這個關於建築衛生的知識話語難道僅只停留在教科書與專業學科中? 它是否曾經透過什麼樣的方式進入社會大眾的視野中? 實際上, 正在建築衛生話語被寫就為衛生學教科書內容的同時, 一群都市、建築、公共衛生及家政專家早已經開始從另一個管道向社會大眾描繪著一個帶著現代理想生活的美麗遠景, 而衛生現代性的建築轉譯也在那裡被重新編寫。

#### 第四節 理想家庭的論述形構

正當衛生現代性向居住環境注入必要知識話語的同時, 另一個關注住屋條件的話語行動也正伺機展開。它是更廣泛關於何謂一個「理想家庭」論述實踐的一部份。1952 年初, 當時的官方報紙《中央日報》連續兩個月以「我們的家庭」為主題大篇幅登載了十多篇文章, 向社會大眾推廣所謂「理想家庭」應該知道的生活知識。這個短期專欄得到相當的回響, 中央日報社便立即在 1952 年三月將這些文章《我們的家庭》為名集結出版(註 11)。這系列關於何謂「理想住宅」的討論, 讓我們對於當時人們如何想像一個理想的家及其建築標準有了基本的瞭解, 也讓我們看到關於衛生現代性的專業學科知識如何轉譯成一整套現代居住的規範性話語。

事實上, 《我們的家庭》這本書是該報社繼《我們的身體》發行單行本之後的第二本特輯。從本書編輯前言中我們清楚地瞭解, 這些從身體與家庭出發的系列文章, 並非單獨個別話語行動的任意集結, 而是有系統有目標的一個知識行動。各主題皆在專家學者指導下, 由該報社派記者專門執筆撰稿, 並且預先設定了適於一般人閱讀的敘事策略, 嘗試以一對虛擬的新婚夫婦作為主角, 搭配上具有專業知識背景的親戚, 負責向這對新婚夫妻解說各種現代

家務知識。也正是在協助新婚夫妻尋找適當住房的談論中，衛生現代性的知識構造被明確轉化為「理想住宅」的知識論述。

### 一、從房屋衛生到理想住宅

在《我們的家庭》中，充足的日光與新鮮的空氣依然是「理想住宅」居住衛生的基本要項。專家用了建築管理術語表示，每個居室的採光面積不得小於室內面積的十分之三，（中央日報，1952：63）才能使房子裡每部份得到充足日光與新鮮空氣（註12）。同時，專家從每人每小時生活所需之新鮮空氣推算，每一人生活所必需的「空氣地位」，即容許有空氣存在的空間之體積，為四百四十立方英尺，以屋高十至十二英尺來計算，每個人應至少佔有地面面積四十平方英尺，約合兩個榻榻米多一點。從這個空間量的估計來看，在專家眼中，當時主角所配房舍以起居室而言，「把傢俱所佔去的地位除開不算，

適合你們一家四口的需要而有餘。」（中央日報，1952：64）這就給了生活空間必要面積的理性計算，同時也透露出以「一家四口」的核心家庭想像被挾帶到住宅的使用密度上。

同時，除了開窗面積以及居室空間量以外，採光的知識也進一步針對開窗形式影響室內採光品質的向度加以討論。（註13）在建築專家的建議下，傳統舊式狹長的直式窗對同樣深度的屋內光線而言，其採光效果被認為比橫向長窗來得弱。（註14）這樣的話語展現了一種非常不同於「舊式生活」對於光線的理解與感受，既試圖脫離傳統建築的構造情境，又於強調「充足」光線的必要時，帶出了一個有別於傳統建築的開窗形式。就這麼，衛生的話語被不僅僅被轉化為建築的技術話語，也被轉化為一個試圖與舊式或傳統建築採光方式加以區別的新知識系統。（圖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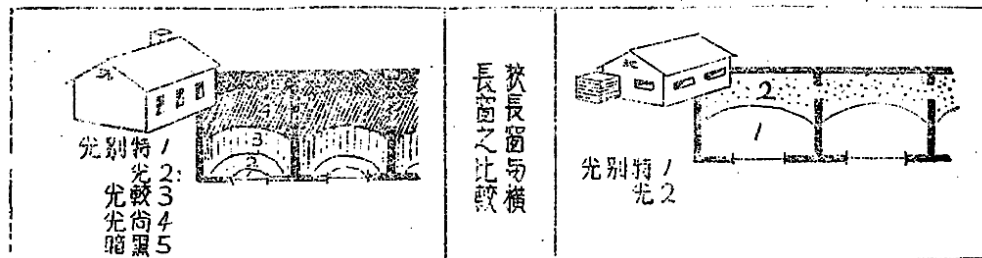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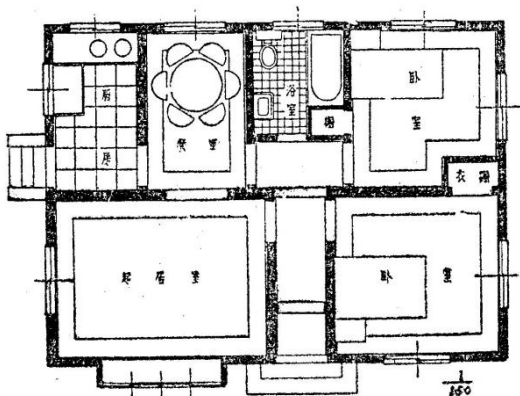
圖9：《我們的家庭》對建築物開窗形式的看法，認為水平窗帶比垂直窗帶要能提供室內更充裕的光線。（資料來源：《我們的家庭》，1952，頁96）

再者，在此衛生現代性向「理想住宅」轉換的知識系統中，建築材料及構造方式也受到關注。譬如，住宅四週需要鋪設排水溝以確保建築維持乾燥。同時，建築基礎也被強調應該砌築得愈深才愈安全，特別是一般平房的牆基厚度「至少應當是牆厚的二倍」。（中央日報，1952：60）而且為防止基腳下面的水，由於牆腳的毛細孔作用，朝上面滲冒，「講究一點的房子還有在距地一二英尺處的牆腳上嵌入銅片或其他不易銹的金屬薄片」，（中央日報，1952：61）不僅能改善建築的潮濕現象，也能防止蟲類進入室內。在這些話語中，房屋構造不僅需要有安全的考慮，更重要的是從防潮防蟲的衛生角度被論及。

此外，衛生現代性的話語除了日光、空氣品質、防潮、防蟲等建築知識的強調，還關注著居住區位及建築密度的議題，並且成為「理想住宅」的必要考量條件。居住「區位」的論點透過女主角申請到任職機構配給距離市區約半小時車程的郊區平房住宅，被塑造成為一個與工作相分離的市郊區位模式。這種居住區位的選擇模式在過去的台灣並非不常見，但在這裡卻被以居住安全的角度重新詮釋，郊區住宅「因為遠避了工業區和市區主要公路鐵路線，使人們走進新住宅區來的第一個印象是恬靜、優美、閒適。」而確定了區位上的優先性（中央日報，1952：59）。另外，「理想住宅」話語也從衛生及安全的角度強調基地空地的重要性，住宅建築面積佔全部基

地面積的比例，被認為應該僅佔三分之一；而建築與基地前巷道也至少有十五英尺的距離，如此才能夠保障基地內的日照效果，並且「可以遠避街道的嘈雜聲音，也不致讓馬路上的灰塵直接揚進屋子裡來。」（中央日報，1952：60）在這裡，降低居住密度透過一個與市區工作相分離的郊區住宅方案而被大力引介。相較之下，「市內舊住宅區房屋毗接，一點空地都不保留，屋後偶或留下一塊小草坪，許多也被住戶們私自改建臨時屋子了，因此，舊住宅區的房屋就像火柴匣一樣，一個接一個排著，不僅新鮮的空氣談不到，萬一有一家失慎，立刻一片火海。」（中央日報，1952：60）這種居住密度過高的都市現象，在日照、空氣品質及消防安全都難以兼顧的話語中成為強烈的對照，突顯出理想郊區住宅低密度的優點特質。

低密度基地上的理想住宅形象也難得的透過透視圖及平面圖這類建築的語彙加以呈現。（圖 10）從



圖面顯示，這座為主人翁打造的理想住宅是一座斜屋頂平房的獨戶建築，屋外花草扶疏，入口玄關位於房子的正中，室內空間則被玄關動線一分為二，右側有前後兩間臥室，左側前方為起居室，經過一開口通至餐室，而餐室則分別有開口通往邊間的廚房以及位於入口正後方的廁所。當我們仔細觀察這個郊區理想住宅的平面圖，它的確盡可能地符合了建築衛生的基本要求，居室中除了餐室及廁所因為位置的緣故僅有一臨外的牆能開窗，其他所有房間幾乎都在靠外牆兩側開有兩向對外的窗戶，充份為室內外的空氣流通與採光提供了足夠的開口面積。此外，在這座理想住宅中最突出的應該是它採用了上述《衛生學》強調「最衛生」的三件式「水洗廁所」。而透視圖中房子周圍的花園與小徑也呈現出建築物前後留設有大量空地，具體地納入採光、通風及防火等衛生、安全考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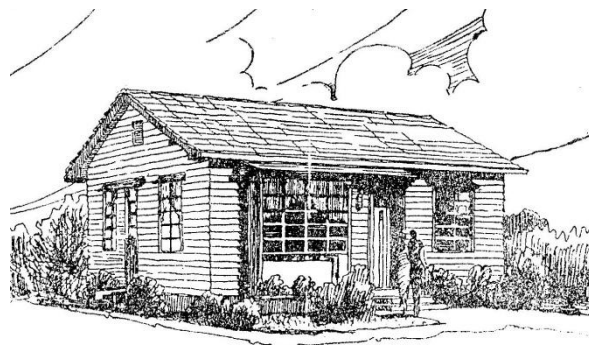


圖 10：《我們的家庭》提議的「理想住宅」平面圖及外觀透視圖。（資料來源：《我們的家庭》，1952，頁 65/66）

## 二、異文化的空間想像及其文化政治意涵

伴隨著這個以衛生、安全為考量的住宅而來的，是一個和現實世界中既存的住宅形態全然不同的空間形態及生活想像，並在幾個面向上展現出它的異質性。首先，從平面圖的尺寸加以預估，這個為一戶新婚夫妻及未來應該是一家四口所需的住宅應該有 21 坪大小，與當時一般家戶的居住坪數約 13 到 17 坪比起來，實在相當寬敞，若非類似書中夫妻任職於公家機構，一般住戶很難買得起這樣的獨戶住

宅。另外，這個住宅形態所呈現的方正格局，將一組看來是先進的「水洗式廁所」置入了住宅內，並將廁所開口對著室內，這對於當時仍在使用掏汲式廁所的人們而言，實在難以想像，特別是當時都市缺乏水肥運送人力，以致於家家戶戶時常等不到水肥運送車而帶來的「黃禍」威脅，讓一般住戶很難接受將一間隨時會發出異味的廁所放在室內。而它看來寬敞的廚房在現實中一旦要塞下一個盛水的大水缸，又要讓人費力地燒著煤球，便不見得如預期地適當。也就是說，當我們將這個住宅空間格局帶



入真實的家務使用，它便顯得相當格格不入。而這個格格不入更是突顯出這個住宅形態根本是一個充滿著異文化想像下的產物。

如果我們再將這個理想住宅的總體空間格局與當時佔大多數的台灣傳統合院住宅及都市店屋相比較，那麼它的異質性就更加突顯。首先，最明顯的差別是玄關入口的出現。台灣傳統農村住宅沒有入口玄關，而是以向戶外開放的簷廊作為正廳與室外銜接的過渡空間，即便都市裡的店屋也只有騎樓作為與道路的緩衝，而這個位於郊區的理想住宅，雖也是二披水斜屋頂建築，卻從其入口玄關的設置——先以一或兩個階梯將入口地坪抬高，開門後以一窄而深的通道將屋外的吵雜拋在身後，才能進入主室中，這一連串的设置，透露出一種當時尚未形成的隱私控制機制。第二，「起居室」不僅是連這個名稱在過去都不曾出現過，而且，從平面圖中完全未畫出家俱線來判斷，究竟「起居室」該如何「起居」，亦即這個空間究竟應如何使用，似乎超出了當時的想像，但卻仍舊在總體面積不甚寬裕的條件下，將此「起居室」配置成全屋最大空間，等待著一種屬於「現代家庭」的未來使用。第三，擁有線性流理枱式的廚房，以及一間三件式衛生設備的浴室，皆與現實中家庭給排水的方式上呈現出極大的異質性，標誌著一個新家務內涵的想像。另外，迥異於傳統合院在其構造條件上以及對環境的適應上所相應呈現的線性空間配置及彈性使用，理想住宅方案中確定而分化的空間內容（起居是起居，餐室是餐室，臥室是臥室，每一個空間被明確的家居功能予以命名），透過內部通道被聯結而形成一種內聚性的空間配置，再次提示出住宅所處的腹地不甚寬濶的都市脈絡，並預言著一個缺乏網絡支持的核心家庭單元的浮現。正是在這些與傳統合院住宅與都市店屋之間的差異與斷裂，理想住宅得以被明示為一個充滿朝氣的、衛生而新穎的未來新方案。

然而，當我們從一個歷史的距離省視當時對「理想住宅」的衛生現代性描繪時，也絕不能忽略伴隨衛生現代性的建築轉譯而附著於這些住宅形態提案中的文化及美學政治意涵。首先是關於住宅「使用」的文化性考量，《我們的家庭》決定捨去當時市區內留下大量日式住宅的使用想像，採取接近西式的新

住宅使用型態，亦即不以日式住宅那種抬高地坪、鋪設榻榻米，室內隔間為木製活動拉門，以及家中無需傢俱、拾物的方式，而採取了室內鋪設木地板，各房間之間以固定實牆分隔，每間室內配置必要傢俱的使用形態。這個取捨，一方面有著哪一種居住使用方式比較「現代化」的考慮，譬如在日常居住使用中檢選出衛生設備加以對照，日式住宅的衛生設備被認為「比中式的廁所似乎進步一點，但又不夠現代化的水準。」（中央日報，1952：63）相較之下，理想住宅配置的「沖洗式廁所」才具備「現代」的衛生標準，而這便是不論傳統中式或日式住宅達不到的，所以需要重新創造一個新的居住使用與空間形態。另一方面，則是對於居住文化差異的慎重考量；一者是對於榻榻米房間席地而坐、席地而臥等使用習慣的不適，「從大陸來的，住進了日式房子，依然在榻榻米上裝載一些桌椅床鋪，重床疊架，榻榻米便變為多餘的了。」（中央日報，1952：63）再者則是難以習慣日式住宅內活動隔間帶來的隱私問題，尤其是「中國的舊倫理觀念，在中國人的家庭生活裡，仍然保留一部份影響，不論你怎麼新，新到主張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制，你沒有法子擺脫親友的投靠。這一張薄薄的紙門，便沒有人信賴它可以作為房子與房子之間的屏障。」（中央日報，1952：63）在這個以文化及生活慣習差異作為取捨考量的語境中，「理想住宅」在肩負起提高現代衛生條件與生活隱私這個角色的同時，也確定了它既非傳統合院住宅、也非日式木造住宅在空間形態上的正當性。正是在這裡，這個開始成形的「理想住宅」透過它在空間形態與使用慣習特性，為一個改換了政權的新台灣所面臨的新生活提供了日常居住空間形式的新想像。

另外，不僅在住宅形態上存在著文化政治考量，在理想住宅獨幢平房中如何佈置「庭園」，不僅符應衛生現代性的各種要求，也同時具備著特定的美學政治意涵。關於如何「治園」，《我們的家庭》特別請來一位園藝專家教導新婚夫妻如何在家中庭園內種植樹木花草，並且透過仔細教導如何整地、播種、移栽、灌溉、施肥、修剪、保護等園藝知識，將園藝塑造為改善都市生活枯燥的妙方。這個庭園景觀的知識乍看之下與衛生無關，也與一個理想家庭的居住慣習的現代提昇無甚關聯，但卻是「理想住宅」

最能討論「美」的所在。也正是這個庭園住宅的現代角色，扣連了國家的都市治理想像。

前述「行政院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於 1955 年完成第一批示範興建的「都市住宅」，便是被安放在展現「都市園林」意象的話語中受到讚譽。當時中央日報以「國民住宅示範展覽」社論大篇幅報導這項國家首度展開的住宅治理行動，認為它充份展現出政治領導者強調「城市鄉村化、鄉村城市化」的市鄉治理原則：

國民住宅的興建，雖由政府輔導人民以自力為之，亦須與國家整個建設計劃的原則，相互配合。總統說：『我們的市鄉建設計劃，應該以城市鄉村化、鄉村城市化為根本原則。要鄉村城市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鄉村能享受公共事業的便利。要城市鄉村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城市能享受園林景色。』台灣各城市原有的住宅區房屋，類多留有頗多的園林隙地。此次行政院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所設計的標準國民住宅，對於住宅周圍的園地，亦都能顧及，可使都市居民，對日光空氣的享受，不致為鬧市的塵囂，與工廠的煤煙所剝奪，頗能符合城市鄉村人的原則。（中央日報，1955，第 3 版）

這樣的話語讓我們清楚地觀察到，作為體現國家都市治理中強調「城市鄉村化」的具體建築實踐（包括那些被甄選的建築設計方案，以及第一批興建出的示範住宅（圖 11））透過其獨戶花園平房的住宅形式，嘗試在衛生現代性的「理想住宅」身影中，營造出一座花木扶疏的園林住宅，這不僅是中國文人建築的重要象徵，更是戰後國家住宅治理論述中極為重要的美學政治話語。

總括而言，這個接合衛生現代性及理想家庭論述的國家住宅治理方案，讓我們看到了現代性的話語實踐在建築現代性的歷史構成中帶著的迂迴性格。表面上看起來完全不具備任何「現代建築」表情的住宅方案，在實際的語境中卻承載了當時社會對於一個現代化生活的具體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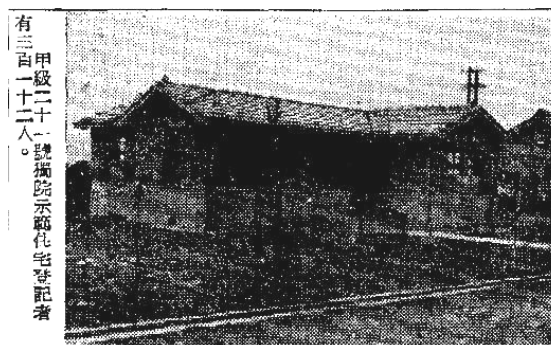


圖 11：完成興建的都市住宅示範房屋中之甲級獨院住宅。（資料來源：《中央日報》，1954 年 11 月 2 日，第 3 版）

從這個將現代性的歷史建構放到日常居住層面加以理解的角度，表示我們對建築現代性歷史構成的認識，就絕不只是針對西方現代建築形式話語表面擬仿的搜羅，也絕不僅停留於觀察建築生產各面向（結構系統、技術及空間機能）的理性計算。那樣的觀察與談論，是一再地把建築現代性論述置於學科內部進行學科知識的再生產，忽略了建築生產所處的真实社會脈絡，以及在此社會流竄的各種現代性話語如何搭配上建築的日常實踐，並且影響了人們對於一個「嶄新的」、「現代的」建築認識。而我們也正是站在一般人理解中的建築實踐這個視野位置上，才能夠清晰地指稱，那消失於現代建築論述中的「理想住宅」方案，其實正是建築現代性構成的鮮明例證。

## 第五節小結：現實中錯置的示範住宅

由上述戰後衛生現代性在都市治理中面臨的艱難處境，進而從身體健康的角度出發向房屋衛生進行話語轉譯，並提出與衛生論述相應的空間規訓方案，因而接合上一股當時關於現代「理想家庭」在空間想像上的談論及規劃，簡言之，在社會大眾談論中開始出現了什麼是一個理想的、現代的居住環境，以及相應的家庭型態的話語中，本文主張「建築現代性」的探究，不應僅只是針對特定建築實踐乃至其建築形式語彙是否彰顯了來自西方十九世紀現代建築運動中「理性」思維，必竟這樣的思維及

視角存在著對來自西方現代建築實踐標準的全盤接受，從而在排除了現實社會中絕大部份不被歸類為「體現」現代建築精神的「其餘」建築實踐的同時，無法回答這個社會如何能透過少數精英建築師的建築實踐，進行日常生活中的現代性體驗與經驗轉化。難道僅由少數兩幢王大閔的住宅作品，人們就能理解並轉化一個坐落到日常居住經驗中的現代感？必竟這類「現代建築」的空間經驗，無法也並沒有被大量複製得讓人們能近身體會。作為一個比較，文學的現代性構成或許在媒介的差異上比較能如此預設，亦即藉由文化精英在報刊書籍中呈現的文學作品觀察現代性經驗的日常轉化，但也都存在著論述精英化的危機。更何況大部份現代建築論述話語中的建築實踐，要不是根本無法讓一般人能經驗得到（如上述那些精英自宅），要不就是它的空間尺度與它試圖塑造的現代性內容過於抽象（譬如，大型公共建築的視覺理性衝擊），都距離人們日常生活太遙遠而難以轉換。如果現代建築論述真正關注「現代理性」的普遍化議題，而且是帶有「自覺」地關注，亦即不只是毫無批判地擁抱「現代理性」，那麼，它就應該要更具體的明晰這些建築實踐的現代性構造與現代主體在日常生活中的現代性體會之間究竟存在著哪些互動與交流，乃至於這些現代建築實踐在現代主體的構成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抑或是這些現代建築的理性實踐究竟為現實社會帶來了什麼具體影響，而不只是停留在現代理性態度給建築實踐帶來什麼工具理性思維的層面，還必須繼續追問，透過這些工程理性的細究，究竟給這個社會帶來了什麼不同於過去的空間、知識與權力認識。否則，它無法避免將成為僅僅是學院內「行話」的反覆知識再生產，除了建構起知識權威之外，完全無助於我們反思「現代理性」對社會帶來的身體權力效果、倫理效果。

相對地，當我們將「建築現代性」的構成放到一個與衛生、理想家庭等現代性話語交互影響、轉化的日常建築實踐時，將能夠進一步追問，一種對於傅柯來說具有身體規訓意涵的現代社會，在我們這個不同的歷史文化脈絡下所呈現的獨特「現代性」，究竟是透過哪些話語、進行著什麼樣的話語轉譯，乃至於藉由什麼樣空間規訓效果構成的。也只有對於這個社會帶著規訓權力印記的「現代性」構成

的歷史辨明中，我們也才能夠進一步認識到，「建築」（包括作為其中一種建築類型的「住宅」）作為空間文化形式，它不僅僅具有召喚國族認同的意識形態效果，它更是將現代主體編入一個更複雜的權力生成網絡中的一環。同時，也只有藉由將建築視為空間文化形式的角度，我們才有機會捕捉台灣現代化過程中消失的環節，進而從後殖民的視角反思台灣殖民「現代性」生成的歷史構造。

正是從這樣的視角我們才能突破既有論述的邊界，一個過去從不會成為現代建築論述焦點的「住宅」才有可能進入討論「現代性」的知識菱鏡中。這個突破是我們有意識地翻轉對於「現代性」的主流理解，一種不同於殖民現代性主體不自覺地沐浴著遠自西方臨下的關於現代美好的種種，而要試著看到「現代性」歷史構成中存在著的知識權力運作網絡。

理想住宅方案在歷史（檔案）中消失，也同時消失在建築專業者（建築師、建築史家、建築評論等）的目光之中。這絕非歷史的偶然，更不是某些作用者（如國家機器或精英建築師）的刻意行徑，而是支配性的現代化論述壓抑、排除的結果，是壓抑過程所遺留下來／生產出來的殖民現代性主體的徵候。也就是說，當現代建築論述不自覺地接受支配性的現代化論述（譬如，認為西方現代建築展現的現代理性是我們評斷這個社會建築實踐的標準）而生產出特定論述話語的同時，其實正是它不願面對，或是毫無意識於自身帶著的「被」（西方現代理性牽引下的）殖民心態，不論當時是否仍還處於實際的殖民統治體制中。正是這個殖民現代性主體不自覺的、壓抑的「被殖民」心態，使它無法在其論述話語之外看到建築現代性構成的歷史路徑，當然也更不可能看到這個現代性構成中的知識權力網絡。從這個觀察中，上述被現代建築論述排除而消失了的理想住宅方案，便正好是我們開啟這個殖民現代性主體生產巧門的一把關鍵鑰匙。

故事到這裡並未結束，這個被我在文章一開始稱作是「消失」的「理想住宅」方案，雖然在本文中經由建築現代性的各方轉譯得到了揭顯，但在現實處境中，它卻真真實實地只維持了短暫的時光。大概的狀況是，雖然這項「示範住宅」在風光揭幕

的當兒，的確是國家以及社會大眾眼中最令人稱羨的「理想住宅」，數以百計的人潮紛紛下訂，希望能夠抽中签獲得購買權力，但它的理想形象實際上是要付出不小的代價，不論是個人代價或社會代價。當時甲乙丙丁四類示範住宅中最頂級的甲類住宅，土地面積則近百坪，建築面積包括室內各項起居、餐室、二至三間臥室、廚房、廁所、浴室等加起來超過 20 坪，居住及生活標準比起當時最需要房子的底層民眾高出許多，以致於人們需要花費比平常多四、五倍的購屋費用，這絕非一般人花費得起的、供養得起的生活品質；也就是說，這項具體把《我們的家庭》所描繪的「理想住宅」實踐出來的示範住宅方案，只對某些人而言是實際可得的，但對於絕大多數的市民而言，它卻更像難以企及的空中樓閣。

在《我們的家庭》中由機關配給房舍的故事，回到現實裡則成為國家試圖以示範住宅方案吸引市民自行購地興建房舍，或由機關興建後讓市民以貸款方式購屋。無論哪種方式，這個示範住宅方案已然為住宅的生產與分配投入了明確的「私有化」意象。這也讓那強調都市園林中美麗、衛生的「理想住宅」的現代意涵附加上了私有財產制的現實面容。這個意思是，當人們被「理想住宅」中各種現代性話語所帶來的美麗光暈吸引著目光而想要追逐捕獲時，他便得踏入一個已然被設想好的「私有化」機制，而且一旦踏入便難以停下腳步。

但同時，台北市自戰後以來，不到六、七年的時間人口從不到五十萬增加了一倍半，（陳紹馨，1979：220）可是住宅量的興建速度卻遠遠慢於都市人口增加的速度，人們被迫選擇居住於簡陋狹小的房舍中，更多人是居住於在都市空地上隨意搭建的違章住宅內；這個現象造成的不只是居住衛生條件的難以控制，更是都市治理上的失控。面對愈來愈嚴重的住宅問題，國家的住宅治理因而面臨了兩難的處境，必竟以「理想住宅」模型促進人們展開一個住宅現代性的追尋之夢，在現實中卻難以加快住宅興建的速度；意思是，即便促進市民自力興建是這項「示範住宅」原本的治理目標之一，但過於「理想」的生活標準帶來的超額預算遠非平常人等負擔得起，以致於減緩了人們興建的意願。以致於，相

當吊詭地，我們原本以為這個示範方案中「理想住宅」映射出的美麗光彩會將人們推向一個永不停息的現代追求，但在現實中卻因為它與人們真實處境之間難以跨越的裂隙，而阻卻了人們追夢的腳步。

回到歷史的軌跡中，關鍵或許並不在於這個體現著「理想住宅」的「示範住宅」方案，後來如何由於國家住宅治理政策的錯置而遭取代的現實過程，重要的是，這個被「衛生現代性」與「理想住宅」等論述話語塑造出來的建築現代性形象，提供了一個異質地景，就像是拉岡筆下自我的一面鏡子，映照出現實自我的支離破碎，卻又不斷地朝著這個現代理想形象努力改造自身，不斷地尋找一種不同於以往的、現代的生活空間想像；並在此虛幻的追尋中保持自以為完整的自我認識。

## 註釋

註 1 這是我關於公寓體制的現代構成研究中的一部份。在我以台北為基地展開的歷史觀察中，我發現「公寓」這個住宅形態之所以能夠極短時間中成為台北城市住宅的主流建築類型，與這個城市戰後初次面臨的一場現代性論述帶來的經驗衝擊有關。

註 2 這個研究取向近年來研究成果豐富，譬如：雷祥麟對於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社會衛生觀念與國家治理能力的歷史探究。（雷祥麟，2004）陳淑芬關於戰後國家防疫行動的歷史觀察，非常具有創見地指出 228 事件與國家防疫行動疲軟無力有關。（陳淑芬，2000）另外，郭文華則從家庭計劃工作的制度史，側寫國家的身體治理方案。（郭文華，1997）

註 3 這個政治經濟學取向的研究，首先由張景森在博士論文中提出開創性的分析架構。（張景森，1991）另外，曾旭正也在這個視野脈絡下繼續更詳細地提出對都市治理的政治經濟分析。（曾旭正，1994）

註 4 根據羅芙芸的研究，傅雅蘭在十九世紀末積極地翻譯各種西方科學論著，讓他的名字在當時「幾乎成為“西方知識”翻譯的同義詞。」（羅芙

芸，2007：116)

註 5 譬如，《衛生雜誌》便自民國三十九年開始陸續由衛生官員撰文檢討「環境衛生問題」。見王祖祥，1950：6-10；顏春輝，1950：10-12；本刊專訪，1950：33-34；劉瑞恒，1951：4-5；王祖祥，1951：5-7。

註 6 該書作者之一經利彬在當時是衛生官員。

註 7 該書在關於傳染病管理上，提到兩類一般性的預防方法，一是避免病菌入侵人體內，另一則是增高宿主（即人體）抵抗力。改善環境衛生是在前一類預防方法中重要的預防面向。

註 8 當時台北市區主要的地面水收集來源分南北兩處，北是陽明山水源，南是新店溪。省公共工程局，1961，無頁碼標示。

註 9 這是《中國一周》，1951年5月21日第56期的封面照片。

註 10 此十大原則為：浴日光；暢空氣；慎飲食；重整潔；勤勞動；善休息；適環境；正思慮；調七情；節嗜欲。

註 11 《我們的家庭》於1952年3月8日初版即刷了5萬冊，繼而又在3月15日再版了2萬冊，出版時間與報上連載時間相差2個月不到。

註 12 當時《建築技術規則》訂定開窗面積至少必需室內面積十分之一。（謝文豐，2005：115）

註 13 這份部是由當時重要的都市計劃與建築學者盧毓駿指導，由徐佳士撰寫的〈燈明水淨，風日雙清〉一章，《我們的家庭》，頁96-97。

註 14 「就瞧這兩排向東南方開著的橫式長窗吧，比那舊式狹長的直式窗子就更便利於空氣和陽光的拜訪。」《我們的家庭》，頁97。

## 參考文獻

〈都市住宅示範房屋 圖案模型定期展覽〉

1954 《中央日報》11月4日，第3版。

〈計劃都市住宅 先建示範房屋2500幢〉

1954 《中央日報》11月11日，第3版。

〈示範住宅展覽 今舉行揭幕禮〉

1955 《中央日報》10月16日，第3版。

中央日報社主編

1952 《我們的家庭》，台北：編者。

《中國一周》

1951 5月21日，第56期，封面照片。

王祖祥

1950 〈環境衛生問題〉，《衛生雜誌》1(9)：6-10。

1951 〈都市衛生重要工作〉，《衛生雜誌》3(8)：5-7。

本刊專訪

1950 〈台北市的環境衛生〉，《衛生雜誌》2(2)：33-34。

台北市議會

1951 〈台北市議會首屆第四次大會議事錄〉，頁99。

1952 〈台北市議會首屆第五次大會議事錄〉，頁119。

1955 〈台北市議會第三屆第二次大會暨第二次臨時大會議事錄〉，頁102。

邱貴芬

2003，《後殖民及其外》，台北：麥田出版社。

省公共工程局

1961 《台灣省自來水概況》，台北：著者。

范燕秋

1994，《日據前期台灣之公共衛生—以防疫為中心之研究(1895-1920)》，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洪秋芬

2000，〈日治初期葫蘆墩區保甲實施的情形及保正角色的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4，民89.12，頁211-213+215-268。

airiti

黃朝琴

1989 《我的回憶》，台北：龍文出版社。

陳君愷

1993 〈光復之疫：台灣光復初期衛生與文化問題的鉅視性觀察〉，《思與言》31(1)：111-138。

陳淑芬

2000 《戰後之疫：台灣的公共衛生問題與建制》，台北：稻鄉出版社。

陳果夫

1947 《衛生之道》四版，上海：正中書局。

陳紹馨

1979 《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台北：聯經出版社。

郭文華

1997 《一九五〇至七〇年代台灣家庭計劃：醫療政策與女性史的探討》碩士論文，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張文彬

1953 〈井水的消毒〉，《衛生雜誌》5(10)：49。

張景森

1991 《台灣現代城市規劃：一個政治經濟史的考察(1895-1988)》博士論文，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

曾旭正

1994 《戰後台北的都市過程與都市意識形態之研究》博士論文，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

經利彬、張文彬

1972 《衛生學》十一版，台北：正中書局。

雷祥麟

2004 〈衛生為何不是保衛生命-民國時期另類的衛生、自我、與疾病〉，《台灣社會研季刊》，第54期，17-59，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劉瑞恒

1950 〈都市衛生問題〉，《衛生雜誌》3(1)：4-5。

謝文豐

2005 《我國「建築技術規則」涵構之歷史演

化—以「建築設計施工篇」為例》碩士論文，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

顏春輝

1950 〈五年來的台灣衛生〉，《衛生雜誌》1(12)：10-12。

蘇碩斌

2002 《台北近代都市空間之出現—清代至日治時期權力運作模式的變遷》博士論文，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Liu, Lydia H. (劉禾)

2008, 《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1995; 宋偉杰等譯，第二版，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9,《語際書寫：現代思想史寫作批評綱要》，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Rogaski, Ruth (羅芙芸)

2007, 《衛生現代性：中國通商口岸衛生與疾病的含義》(Modern Hygienic: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2004; 向磊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Young, Robert

1981, Untying the Text, Boston, London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